

我习惯从南人口去赶小城集,总觉着这样最为正式。

若从东边进,也就是小城初中门前那条路。我在这里求学四年。我入学那年,班主任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我成了他的第一届学生。我们对这里怀有一样的新奇。他喜欢把白色T恤扎进藏青色裤子里,走起路来,左手手指在颌下搓动,右手自然摆动,间或忽左忽右张望,步速稍快,脚下像装了根弹簧。每天清晨,他骑着一辆“小链合”,从东南方向的矿工人村驶来,进校转弯时划出一个流畅的弧线,像他的板书那样飘逸。第一批入团名单上原本没有我,后来他把我单独叫去办公室,给我一张表,给了我一个惊喜。第二年,省报举办抗洪征文,我投了稿,指导老师那栏,我自作主张写了他。最终获得二等奖,报上印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。他读完报纸,又叫我去办公室,奖励一本精美的笔记本。这次,我给了他一个惊喜。

住在周庄、王庄、张庄的人,要从西面涌入。集市西口就是猪市,实际上也有牛、羊的交易。家里喂的母猪,每年都会下两窝,我常跟着大人到这里卖猪崽。这个集卖不完,下个集再来。庄稼人不缺猪草,除了种地,大都养上一两头猪,长成后卖个好价钱,过个好年。买猪人在猪群里扒拉来扒拉去,直至寻到一头中意的,伸出两只粗手,把猪崽掀个仰面朝天,再抓住左前腿和右后腿,一路小跑着抱去过秤处称重。小猪崽嗷嗷直叫,奶奶扭过头,用手掌抹了抹双眼。集市西部便是省界,常有外省老乡来赶集,虽一路之隔,乡音却迥异,“管管管”“中中中”,不同口音在集市上空交织,却有着彼此的默契与舒适。后来,我曾倾心一位白净的姑娘,无数次走过这条街,那些故事和叹息,早已沉于湖底。

东西街与南北街的交汇处,是集市的北入口,呈丁字状,一旁有个窄巷。坐北朝南是一排店面,多是当地人自己经营。稍往南,路西,庄上的老黑姥爷在这儿有个摊位,每回路过,他总在给人补锅底,坐小凳上敲敲打打,身子前倾,凳子的两条后腿悬在空中。在乡下,锅底用久了易坏,锅身、锅盖还是好的,换个锅底终究划算些。这门手艺是他祖上传下的,到他这儿,怕是最后一辈了——他的两个儿子都进了煤矿,小儿子和我同岁,有一次我还问他,“你咋不学补锅底?”他苦笑,“现在谁还补,都是直接买新的。”老黑姥爷有口福,他的摊位隔壁就是打煎包的,大圆锅盖一掀,雾气升腾,张着嘴的煎包个个透着金黄,



香味飘满整条街。

南口最喧闹,左右两侧的空地上,停满了乌泱泱的自行车。斜对面是一座大煤矿。清早,太阳刚露头,红彤彤的柔光打在连绵起伏的矿山上,像一幅刚着色的油画。我家住在南部,过了火车道再往北几百米就到集市口了。扎上车腿,挎着篮子、或揣个化肥袋子,人们开始赶集,走时须交上车牌,还有一毛钱寄存费。赶集是轻松的,溜溜逛逛,也是在享受时光。也有三两结伴的小伙子,见着好看的姑娘一阵起哄,或打个口哨,害羞的小姑娘掩面加快脚步,走进人群之中。逢上过年,爷爷通常要带上我赶好几个集,第一趟多是买春联的红纸和笔墨、锅碗瓢勺、烹煮大料,当然还要请一张灶老爷,年三十贴在灶台前;下一趟该是置办鸡鱼肉蛋,买到家宰杀、洗净后,挂在屋檐下。谁家挂得多,意味这一年收成好;最后一趟集,买来蔬菜,还有小炒备菜,那时过了正月十五才开集,买少了不够用,买早了又易坏。

采煤沉陷后,村庄搬离,小城集便不复存在了,小城初中也和镇中学合并。人们依然怀念那个小城,怀念集市上的熙熙攘攘,怀念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、追逐嬉闹声。许多次,我于高处远眺,湖面下仿佛倒映出旧时模样,是那么清晰。上了年纪的老人提议在安置区重开小城集,年轻人说镇上的遮阳农贸市场就在眼前,大大小小的超市数都数不过来,还有网购,多快。老人听后便不再多说什么。湖水奔流,日子飞走,有些适合重来,有些止于怀念。

本版配图 / 张大千



行旅

上海,上海

崔玲玲

这次去上海,挑了几条清静的街道,认真当一回“街溜子”。

四月初的上海,温度刚刚好,阳光不灼也不弱,梧桐叶子还没长满,光线从枝叶缝隙漏下来,落在地上,一块明一块暗。我一脚一脚踩在上面,步子不自觉慢下来。沿街散落着网红小店、艺术画廊、小酒馆,夹杂着异国老洋房。每走一步,眼睛都有落点,连行人的背影都成了风景。

越过光影,前面是一对中年外国夫妇走在前头,儿女跟在后面。爸爸背着大双肩包,走走停停,左右看看,妈妈似乎走热了,外套脱下来系在腰间,不时回头和孩子说几句。一家人不紧不慢,像有用不完的时间。

我拐进旁边一条弄堂,窄得很,两人并排走都费劲。靠墙摆了一排鲜花,有一盆叫不出名字,开得正野,淡淡的香,也没看到老板。住在这儿的人,每天进进出出,穿过这些花,日子大概也是香的吧。下一家宠物店,橱窗里蹲着一只圆脸猫,湖蓝色眼睛,腮帮子鼓鼓的,一身纯白毛发。它见我过来,脑袋没动,用睥睨的眼神斜视着我,一副高冷的样子,然后慢悠悠把眼神移开。

临街咖啡馆很多,店不大,门口摆一张矮桌,阳光落在帆布椅扶手上,很想坐进去试试,一定很舒服。难怪一提到上海,

就觉得精致又洋气。

说起对上海的喜欢,可能跟小时候一位上海阿姨有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镇上来了一位上海下放知青当妇女主任,后来嫁给本地的政府职员,生了一儿一女。那时候的农村,大家穿得都差不多,朴素简单,但这位上海阿姨不一样,她身材娇小玲珑,记忆里的她穿什么都好看。每次她从上海探亲回来,要么换了新发型,要么买件新衣裳。不出几天,这种发型和衣服就在镇上流行。

一年夏天,她穿了一条绵绸碎花连衣裙,风一吹,裙摆飘起来。身边的女儿穿件大红蝙蝠衫,像只可爱的精灵,娘俩手拉手,走在那条灰扑扑的老街,好看极了。很快,供销社新进一批布料,绵绸、的确良、乔其纱,五颜六色,一卷一卷码得整整齐齐。

母亲手巧,买回乔其纱,连夜踩缝纫机,给我和姐姐做飘带领褂子。还买了绵绸,给我们裁剪裙子和睡衣。不会裁缝的妈妈们,也会扯上几尺布,丢到隔壁裁缝店,过几天来取。每到这个季节,裁缝店师傅总是忙碌。

那时,觉得大上海远得摸不着,但又是近的,因为镇上有一位上海阿姨。后来听说,她三十多岁时,丈夫因病去世。不久,她带着一双儿女回了上海。

逛到下午一点,倒也不觉累。茂名北路一家挨着一家的西餐厅,店内、门口坐满了人,只觉热闹。对面是海派石库门建筑,有一家咖啡馆的后院不大,随意摆放着玻璃圆桌,绿格子布椅,这种隐于闹市的腔调,吸引所有走到这里的人停下来多看几眼。

回酒店的路上,我选择乘公交车,但不太会用手机支付,反复试了几次,刷不上。这时,前排座位上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姨提醒我关键步骤,教我如何切换城市。上海的普通话语速飞快,但条理清晰,直到“嘀”的一声,支付成功了,她才放心转回身去。我说谢谢,她体面地摆摆手,说没事的。

看着她转过去的背影,突然想起当年镇上那位上海阿姨,如今也有七十多岁了,就算遇见,我们大约也不认识彼此了。但我记得她穿碎花裙的样子,走在那条老街,真好看。